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4

定 价： 0 12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抓丁仇	(3)
逃兵記	(11)
壯丁苦	(17)
两块痂疤	(23)
人財两空	(29)
装了八年“哑巴”	(35)
两种兵的生活	(38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抓丁仇

我是江西萍乡市湘东公社新村大队人。新村大队原来叫姚家洲，住着百来户人家。在旧社会，姚家洲由姚作汉、姚学翹、蕭伯愚等五个地主当权。这五个地主有个綽号，叫“五爪灵官”。他們在姚家洲躁躁脚，滿村的地皮都要打顛顛。

我家几輩子給地主当佃戶。租种地主的地，拚死累活地干一年，交了租子还是餓肚子。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不讓我們安安稳稳地过下去。一九三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在村里抓开了壮丁，从此，在我們穷人脖子上又套上了一根吊命索。

糠里榨油

那时，我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大儿子刚滿十七岁。照說，十七岁沒到当兵的年齡，可是因为我余家是弱門小姓，又穷又苦，抓壮丁的事一来，“五爪灵官”就先拿我开刀了。

那一年，地主蕭伯愚当伪保长。接到抓壮丁的通知，他馬上帶領乡公所的多丁来我家抓人。因为我早就听到了风声，事先叫大儿子逃到外面做篾工去了，他們来捉人扑了个空。到了这年春节，我老婆好久沒見儿子的面，想要他回家过个新年。眼見抓壮丁也似乎松了些，于是，我暗地里捎信把大儿子叫回家来。正月里，姚家洲学校門口唱大戏。我大儿子混在

人群里去看戏，叫保长萧伯愚瞧见了，立即被几个乡丁五花大绑地捆起来，抓走了。

我听说儿子被抓了，就和老婆急忙赶到保公所，向萧保长求情，说：“保长，我那儿子还没一枪杆高，求你抬抬手，给我们留个活路吧！”萧伯愚板着铁青的面孔说：“抓壮丁是上级的命令，我萧某人只有照办！”尽管他翻脸不认人，我还是一遍一遍求情说好话。萧伯愚眨眨鬼眼，忽然装出一副善人相：“办法倒是有。你请一桌酒，另外拿五十块银元来，我给你去买一个壮丁。”我一听五十块银元，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老婆说：“我家现今没吃没穿，哪有这么多银元？”萧伯愚说：“你不是有头猪，还有园子菜么？卖掉不就是响当当的钱？哼！你们就会装穷叫苦，没钱没钱，糠里还能榨出油来哩！”我老婆说：“这菜我们要当饭吃，猪要卖了度春荒。”萧伯愚冷笑道：“好吧！我乐得清闲，你儿子马上就要解乡公所。乡公所可不比村里，吃猪食，坐水牢，先打得两腿掉肉，再押上去打仗，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。你爹娘不救有啥办法！”说着就要将人押走。我们一听萧保长说得这样吓人，又见大儿子满脸眼泪，呼爹叫娘，心里就象刀子割肉一样。我只得忍痛说：“我……我答应，给钱。”萧保长拍拍长褂子站起身：“看在乡邻面上，我给你办吧！你快回去弄钱。若是钱少了一分一厘，那你大儿子是不是被押走，我可不能担保啊！”

我和老婆回到家，马上将猪和菜变卖了，左凑右凑凑了三十块，又东借西借借了二十块，凑足五十块银元，第二天一早送给了萧伯愚。这下，我以为总可以把人贖出来了。谁知道萧保长掂了掂手上的钱，斜着眼说：“你还得办一桌酒菜啊！”我

說：“就請到我家去吃杯酒吧。”那死保长眼一斜，說：“你家里骯里骯髒，南瓜擦菜，我可吃不下去！”接着他就开了张菜单，要我到湘东菜館去办酒席，还叫挑到他家里去。我是斗大的字也不識得半升的人，拿着这张写滿了黑麻麻一片字的菜单到湘东菜館，賬房把算盘噹啷啷一撥，說：“要十几块錢哩！”我以为他打錯了，說：“你再算算。”他把菜单举到我面前，說：“你不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！辣子鸡、糖醋魚、紅烧肉、清燉魷魚湯、板鴨炒冬笋……大盤小碟，煎炒燉煮什么都有，另加五斤堆花燒酒，沒十几块銀元，我不給你貼老本？”我听他一說，直吓得半天說不出話来。我原想，請桌酒，最好也莫过于吃肉、吃魚、吃鸡，誰知他們吃东西还有这么多鬼花样！我想，蕭保长手黑心狠，說得出，做得出，要是不办酒席，人是不会放的。眼下，五十块冤枉錢都出了，这十几块錢就是割肉也得挺着。賬房說：“办么？”我含着眼泪点了下头，扶着店門走到街上。我只觉得天地都在打轉。蕭保长一句話就从我手里刮去六十多块銀元，这六十多块銀元叫我一生一世也还不清啊！

骨上削肉

我为救大儿子，被弄得傾家蕩产，想不到大儿子放出来還沒六个月，蕭伯愚又帶着兵来我家抓壮丁了。我說：“我不是請了酒出了錢么？”蕭保长眼一瞪：“出了几块錢我能給你保一辈子？这一期的壮丁又下来了，你二儿子又中了头签。”这天我几个儿子恰好都出去了，沒有抓着。蕭保长吹鬚子瞪眼朝我罵：“躲得了今日，躲不了明日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！”

蕭保长走后，我馬上出門，找到几个儿子。要大儿子赶快

逃到外乡去做手艺，我自己带着老二老三，一边种田，一边打望。只要听到狗叫，或者門前有脚步响，丢下傢具就往后門蹓。晚上就睡在河边的柑子园里。俗話說：“七月蚊子生角，八月蚊子生牙。”我父子三人被蚊子咬得滿身是青紅疙瘩。我担心发摆子病，有天晚上，就和两个儿子回家来睡。半夜时分，蕭保长突然带人来把我家屋子包围了，乡丁一拥而上，冲进門来，把我和两个儿子都抓住了。蕭伯愚喝令乡丁将我二儿子五花大綁地捆起来。我老婆忙向蕭保长求情，蕭伯愚理都不理，向我說：“余德順，为抓壮丁弄得我們耽誤了睡觉，你也該拿点东西給我們吃吃啊！”我知道他是听見我的一只留种鸡叫，想吃鸡肉，我只好把留种鸡杀了。誰知这伙狗东西吃完鸡，嘴巴一抹，押着人就走。我拖住蕭保长說：“求你再給我想想办法。”那鬼东西走了几步，反轉臉說：“你再办桌酒席吧！”我說：“眼下我吃粥都沒有米，糠里再也榨不出油来了！”他說：“你妹妹不是嫁在河背么？要她給你办桌就是！”我想，倒不如再挨下痛，救出二儿子，全家人出外逃命。我答应了。我妹子家也很穷，妹夫在外謀生。她听說只要办桌酒就可以救侄子，就答应下来。那天，蕭伯愚和乡代表姚作汉等几个地主都来了。吃酒时，蕭保长和姚作汉眉来眼去，悄声說了些什么。一会，蕭保长叫我放下壶，让我妹子斟酒。姚作汉就趁这机会賊眉溜眼地朝她身上身下看，还說些下流話。我妹子忍气吞声斟了一輪，就丢下壶进厨房去了。吃罢飯，我以为事情也就完了。誰知蕭保长却叫到我身边，厚顏无耻地說：“要放你二儿子还有一条：乡代表姚作汉先生要你妹妹跟他睡上一夜。”我一听这話，直气得全身发抖。我余德順一忍再忍，一让再



半夜时分，萧保长突然带人来把我家屋子包围了，抓走了我的二儿子。

让，誰知这些狗东西却得寸进尺，糠里榨了油，骨头上还要割肉。财主的心肝就是这样黑，这样狠！蕭保长見我不說話，推推我的肩說：“可以么？”我气得喉嚨冒烟，罵道：“你們这些狼心狗肺的人面畜生，你敢动我的妹子，我和你們白刀子进，紅刀子出！”蕭保长和那狗乡代表碰了硬釘子，冷笑一声，就走了。我妹子代我請的这桌酒也就白費了，算是喂了狗。当天，我二儿子就被押上了前綫。

生 离 死 别

誰知二儿子抓走还未滿一年，蕭保长又提着手杖上了門。“余德順，你三儿子又中了签号！”我一听，真恨不得生吞了这只恶狼，說：“蕭保长，你們财主人家七男八女，半个壮丁也不出，我余德順一年多工夫出了两个壮丁，还少了么？你这不是明明欺負人嗎！”他見我还嘴，瞪起眼罵：“我就欺負你，你敢怎么样！”他見我三儿子沒在家，就把我抓走了。我老婆放下吃奶的孩子，向他求情，他一拳朝我老婆脸上打来，口鼻出血，跌了一丈多远，还凶狠地說：“要你三儿子来牢里换人！”

我被抓进乡公所，关进牢里，又冷又餓。蕭保长和姚作汉勾通乡公所的人，天天对我审問拷打，要我說出大儿子和三儿子逃到哪里去了。不几天，我被他們打得全身沒一块好肉，但是我还是咬着牙关不說，我宁願自己死，也不能让我的儿子去給国民党反动派卖命！

一天，我老婆和三儿子突然跑来了。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老婆說：“你走了后，家里米沒米，錢沒錢，几个小娃子餓得嗷嗷叫，蕭保长每天每夜在我們屋前屋后轉，三儿子不去

当壮丁，全家人都会拖死！”我三儿子也说：“爹，让我去吧！眼下就要下种，我犁耙不熟，你不回去下不了种。再说，躲得了今日，也躲不了明日！这些吃死尸的乌鸦哪会有半点善心！”那时，恰好有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路过姚家洲。他说，让乡保长捆猪吊羊般的抓去，倒不如跟着这军队走了了事。我想，除了这条路还有啥办法呢？

我被释放出来不久，就眼望着儿子被国民党军官又骂又踢地拉走了。人走远了，我老婆也昏昏迷迷地跌坐在路旁的桔子树下。

我坐牢时被乡公所打得遍体鳞伤，出牢后，行动都很困难。老婆见我久病不起，家里吃没吃的，喝没喝的，又常想到三个儿子在外生死不明，加上地主三番五次强迫要夺佃，于是愁上加病，病上添愁，伤透了心，不久，身子一仰，丢下我和一群孩子死了。

这真是“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破偏遇顶头风。”没钱埋葬老婆，只得向地主借了七担谷。地主见我遭难，便乘机发财，把利息定得很高。春上借七担谷，到年终要还二十担，你想，这种阎王债，谁还得起！

老婆的棺材停在屋内没有埋，几个月的娃娃没奶吃，嗓子也哭哑了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，哭着要娘，看着这一切，咸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。有几次我拿起绳子想上吊，也有几次半夜三更走到河边想跳水，可是一想到家里那几个孩子，一想到萧保长、姚作汉这些仇人还活在世界上，我不能死。纵然吃尽千辛万苦，也要把后代抚养大，好向那些吃人的魔鬼报仇。以后，我就带病下田，硬撑硬打地活了下来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萍鄉解放了。接着開土改反惡霸，貧雇農斗倒了姚家洲的“五爪靈官”，積在我心裡十幾年的深仇大恨才報了。今年，我已滿六十八歲。除了二兒子三兒子被抓丁死在外面，家裡還有三兒一女。兒子都娶了媳婦，生了四個孫子，加上我續娶的老伴，全家一共十三口人。前幾年，我又建了新屋。由於我們新村大隊連年增產豐收，生活象吃甘蔗，一節比一節甜。

在舊社會，地主催租逼債，國民黨抓兵抽丁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活不下去。解放後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，我家人口興旺，豐衣足食。因此，我常向兒孫們說：“千萬不要忘了過去那本苦難經，不要忘了窮人的血淚史。只要階級敵人還活在世界上，我們就不能放鬆警惕！”

余德順 口述

譚喜亮 整理

選自江西人民出版社《抓丁仇》

逃兵記

我家住在北京市延庆县留家堡。兄弟俩人，上有老父，下有妻小。

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，到处抓壮丁，去给他当炮灰。这年下半年，我弟弟蒋进孝被抓走了。可是，誰願意为国民党、蒋介石卖命当炮灰呢！誰願意用美国佬的枪炮来打自己的兄弟姐妹！他就在那年十一月逃出来躲到一个亲戚家里。

他逃出来不久，蒋匪军便赶到我家来抓人。这时正是寒冬腊月，我正病着。突然，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蒋匪兵闯进了门口。他们一个个杀气腾腾，气势汹汹，冲着我恶狠狠地嚷道：“蒋进孝在家吗？”我一看事情不妙，胡乱支吾了几句，在这群黑狗正进屋搜查的时候，乘机跨过短篱笆，连翻几道院墙，在村口拿了个粪筐，装作拾粪的样子，逃到别村去躲了起来。

那些黑狗闯进我弟弟屋里，乱抄一通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没抓着弟弟，交不了差，伪保长蒋进恒就出了个坏主意，要把我抓去补空。他们闯到我屋里，一看没人，伪保长就领着这群黑狗四处去寻找。

我一出村子，就找小路走，东躲西藏，在太平庄躲了一会，挨到天黑，又赶到马营舅舅家去。

赶到舅舅家里，已是深夜。刚进大门，舅舅说：“好险啊！那群黑狗已搜到这里来了，在这里翻箱倒柜，折腾了半天，走了还不到吸一支烟的工夫。”

我怕那群黑狗再来，不敢久留，连夜又赶到康庄南面的榆林堡姐姐家里。第二天，听外边风声还是很紧，也不敢住下来，又赶回马营，以后又赶回太平庄。

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，走到太平庄，又冷又渴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夜已很深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再往哪里去呢？我左思右想，又牵挂着家里妻儿老小，就迈着又酸又累的双腿，慢慢走回自己的村子。走到村口，实在渴得没法忍耐，想敲门要水，又怕连累别人，只好在水坑里，抓起两块冰含在嘴里。走进村子，不敢直奔家中，就先到亲戚詹通家去。走到门口，见屋里亮着灯，从门缝往里一看，伪保长蒋进恒正和狗腿子何海在里边大吃大喝呢！我扭头就跑，在漆黑的夜晚，顶着呼呼的寒风，又赶到榆林堡姐姐家里。

有家不能回，亲戚家也不敢久留。我心一横，还是逃到张家口去吧！

好不容易东拼西凑的借了几个钱，想去乘火车。但是，没有伪保长的“证明书”，连车站也不能进。我只好两条腿走了几天，找了个机会上了火车，总算到了张家口。

那年月，哪里有穷人的活路！在张家口，更没有安身的地方，连做零活也找不到门路。几个钱都用光了，寒风和饥饿逼得我只好又离开了张家口。

沿路躲躲藏藏，走了好几天，上哪儿去呢？我想起村上有几个躲兵的穷哥儿们，都去门头沟挖煤了，那里也许有个活

路。于是，就决定去门头沟。

到了西直門，我已身无一文，想吃吃不上，想喝喝不到，又饿又冷，又晒又累。只得拖着两条沉重的腿，走到门头沟。

那时的门头沟煤矿，真是一座人间地狱。天天有人死在煤矿里。有的是被煤块压死，有的给煤气熏死，有的触电电死，还有的饿死，体弱病重的被扔到“万人沟”里，让狼狗活活咬死。我在那里起早摸黑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还是填不饱肚子，而监工的棍棒却不断地打在我们的身上。

熬了一个月，实在没法过下去了。临到年关，我死活也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家，看看自己的亲人。

我赶到西直門，已没有当天的火车，没办法，只得在附近小客棧里住下。

睡到半夜，突然两个警察闯进店里来检查，见我沒有“证明书”，“啪啪”就是几个耳光，打得我头昏眼花。警察还要把我带走，經店里的几个伙計、旅客好說歹說，我又把兜里仅有的几个錢塞給他們，才把他們打发走了。

我双手空空赶回家里，已經是腊月三十的深夜了。夫妻、父子久別重逢，悲喜交集。正在这时候，伪保长蔣进恒領了一个狗腿子突然闖进門来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蔣进恒皮笑肉不笑地說。

“嗯，……請坐……”我心里一陣紧张，还没答完，蔣进恒就恶狠狠地說：“来得正好，咱們一块上村公所走一趟吧！”不由我分說，也不顧一家老小的求情，就把我带走了。

一到村公所，伪保长就狠狠地打我，还叫嚷着：“好啊！你有本領就別回来，我把你找得好苦，看你还逃到哪里去！”



伪保长说：“这次放过了你，下次非抓你去不可；你不想当兵，我偏要你当兵！”

打了一頓，偽保長讓我找來兩個保人，保證再不逃走，才放我回了家。可偽保長還說：“這次放過了，下次非抓你去不可；你不想當兵，我偏要你當兵！”

過了還不到三個月，國民黨又要抓兵了。

一天晚上，偽保長領着幾個狗腿子來到我家的門前，有的把住大門，有的守住牆腳。偽保長還偷偷爬上了屋頂，手持手榴彈，全神貫注地瞧着房前的動靜。陣勢擺好以後，一個人鬼鬼祟祟地走到屋前喊道：“蔣進忠，你出來！”我剛開門，一隻腳還沒跨出門檻，四面守着的人就圍了上來，把我捆得結結實實。當晚就押解到兵營，第二天清早就送往延慶。

可是，國民黨抓得了人，却收不了心。我死活也不甘心當國民黨遭殃軍，心里時時刻刻都在盤算着如何逃出去。就在被抓的第八天，行軍當中，我乘上廁所大家不注意時，又逃跑了。

這次，家鄉更待不得了。我連家也沒顧得去看看，就又逃到門頭溝。

在門頭溝又背了三個月的煤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的老父、妻女。這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夏天，國民黨反动派正忙着逃命。我心想，世道像要變了，咱們窮人出頭的日子快要到了。由於想家心切，在六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又悄悄地回到村里。

走到自己家門口，一看，就呆了。只見自己家的大門關得緊緊的，叫了半天也不見有人。向鄰居一問，原來是在我逃跑不久，那狠心的偽保長就找上門來，逼着我媳婦拿錢去贖人。那時孩子連衣服都穿不上，哪交得出這筆錢？偽保長硬逼着我媳婦把全家依靠着活命的四畝半地、一頭毛驢、兩千塊磚、三棵樹，連鍋帶櫃，折賣成二十二石米，才算交了差。偽保長

把这笔钱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，弄得我家里油尽盐绝，断了烟火。我媳妇没法活下去，只好去投奔亲戚。人一走，连房子也被伪保长封了。

我回家后，东拼西凑，挖点野菜，捋点树叶，才熬过了几个月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，留家堡解放了，我才算出了头。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斗争伪保长蒋进恒的群众大会上，我吐了苦水，伸了冤！蒋进恒这头恶狼，在人民的要求下，终于受到了惩办。

蒋进忠 口述

曾凡勇 整理

选自北京出版社《披荆斩棘造新天》

壮丁苦

想起国民党抓壮丁，給我們貧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就有满肚子的话要说。

解放前，我家很穷，十一口人，只有祖上留下来的七亩地。地少养活不了一家人，就托人说合，租种了地主李洪太几亩地。一家人累断筋骨，拚死拚活地干，才勉强维持了个吃糠咽菜的生活。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哪有穷苦人们过的安生日子呢！

一九三八年，因为年景不好，家里生活很困难。为了一家人能活命，爹叫我做个小生意，卖点纸烟、杂货。一天，我正在和店集上摆摊，伪保长薛华亭的弟弟，猛不防窜到我跟前，恶声恶气地指着我说：“李世平，有人告你，快跟我到乡公所去！”当时，我还以为他是想讹我的烟吸，就赶快站起来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薛二少爷，请吸烟，吸烟……”说着我就拿了四盒香烟，往他手里塞。可是他把手一摆，几个狗腿子，就把我捆了起来，拉到了伪乡公所，硬把我填了壮丁。

家里人听说我被抓了壮丁，都嚎啕大哭起来。娘哭着跑到伪乡公所，可连我的面也见不着。娘气愤极了，就拚上老命，大骂起来。那些恶鬼们哪能容忍穷人的辱骂，就恶狠狠地用枪托照娘的胯骨上打。老年人怎能经得起这样摧残，一会

儿就被打得晕了过去。爹为了营救我，四处借债，先后花了三十多块银元，想把我贖回来，末了还是落个人财两空。

我被带到汝南县城住了一个多月以后，队伍要往水屯集开。当官的怕新兵逃跑，先来了个下马威：在快出发的时候，拉出两个新兵，借口说是逃兵，就地枪毙了。他们把我带到了驻马店，以后又在驻马店坐上火车，朝正南方向开去。

后来到了湖北麻城驻扎下来，开始了法西斯的军事训练。六月的天气，闷热又闷热。白天在火热的太阳下进行操练，晚上那些当官的怕士兵们开小差，就把我们关到小屋里。铺的是湿漉漉的稻草，上边蚊子叮，下边跳蚤咬，再加上几十个人的汗腥气，实在令人难受。没过多久，人人身上就长了疥疮和黄水疮，黑一块，紫一块，活象个烂梨。

那些当官的老爷们，整天吃的是细米白面，山珍海味，而我们士兵天天是两顿稀米粥。就这样，我们还得照常操练。有一次“拔慢步”，因喊“一”和“二”的时间相隔太长，我身体虚弱，支持不了，就在未喊“二”的时候，突然眼冒金花，天旋地转，晕倒在地。匪连长见我倒在地上，恶狠狠的一把从地上把我拉起来，不容分说，照着我的胸口就打，我又栽倒在地上。

这种非人的生活，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一天晚上，我摸黑逃跑了。但头一次开小差没经验，不知隐蔽，加上南方田埂小道，路又不熟，没跑多远就被抓回去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匪连长集合全连士兵，把我拉出来，捺在地上，他先狠狠地打了我三杠子，然后命令全连一百二十多个士兵，每人打三杠子。把我打得死去活来，裤子与肉都粘在一起了。要不是兵怜兵、手下

留情的話，那次准把我打死了。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决心拚上性命再次逃跑。伤好以后，在队伍由江西九江返回湖北黄陂时，我终于逃出了这个“狼窝”。

可是，在那样的混账世道，逃回来还是不得安宁。我在三年中，借债买了四次壮丁，但末了还是脱不掉，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我又被抓走了。

这一次的遭遇，比上次更惨。

就在队伍由汝南开往驻马店时，被驻扎在平汉线的日寇发现了。当官的怕我们被日本鬼子打散逃跑，就用麻绳把我们一个一个捆起来，每十个人串在一起，象赶牲口一样牵着走。因为一个连一个，走得很慢，又不容易隐蔽，结果被日寇打死了很多，被捉住活埋的更多。剩下的士兵，在匪军官的严格看管下，经过泌阳、唐河、南阳和西峡等地，跑到了陕西境界，才幸得脱险。

时隔不久，队伍又返回河南镇平受训。那时镇平正流行伤寒病，好多士兵受了传染。可那些狼心狗肺的当官的，不但不给治疗，反而以隔离为名，偷偷地把重病号活埋掉。这样被活埋的，不知有多少！我当时也得了病，虽然病势不重，但看到他们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，实在寒心，就和一个新蔡县的难友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趁天黑逃出了虎口。一路上，我们怕匪军追赶，不敢进村子，饿了就在田野里找些高粱穗和谷子穗吃，渴了就嚼点高粱秆。就这样，我们走了几十天，才回到了家。

到家后仍待不住，又接连买了两次壮丁。那时，我哥在正阳、信阳、罗山三不管的萧店给地主扛活，我怕再被抓走，就跑



当官的用麻绳把我们一个一个捆起来，每十个人串在一起，象赶牲口一样牵着走。

到哥哥那里躲避，在陡沟一带卖纸烟糊口。

长居在外，很想念家里的老人。就在一九四五年的清明节，我兄弟俩悄悄回家探望。到家一看，父亲、嫂嫂，都因受人欺负，早已先后气死了，母亲也由于家破人亡，整天哭泣，双目失明了。我兄弟俩心象刀绞，抱着娘痛哭了一场。因怕被人发觉，惹出是非，只得怀着深仇大恨，离开了母亲，趁黑夜又逃回陡沟。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穷人逃到哪里，灾难就跟到那里。有一天我贩了几条烟，因天黑没赶回住的地方，就住在一家地主的车棚里。谁知半夜里进来了几个人，说是检查“私货”，又把我抓去填了壮丁。

这是我第三次被抓壮丁，怎么才能逃出这灾难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：自残。有一次当队伍路过正阳东南铜钟休息，在一家饭店喝水时，我看见一把切菜刀，忽然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抓起切菜刀，一刀剁掉了我右手的两个指头。常说，十指连心，我当时就疼得晕过去了。等我清醒过来时，浑身成了个血人。

我这一剁，竟闹出了杀身大祸。伪团长指着我的鼻子，破口大骂了一顿以后，又把我五花大绑捆了起来，说第二天上午召开全团大会枪毙我。

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，我在阶级弟兄的帮助下，又逃出来了。

但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我当时想，右手残废了，今后不会再抓我的壮丁了，谁知一九四六年春天，伪保长林长生还要抓我的壮丁。我说：“保长！我残废了！”伪保长气虎虎地说：“人

殘廢了，可錢沒有殘廢啊！”原來是想要我的錢。

錢，窮人家哪有錢呢？只得東拚西湊向人家借了四石豌豆，買了個壯丁。誰知因為沒有給保長送禮，禍又來了。就在當年秋天的一個上午，突然來了四個穿黃軍裝的，借口抓我的逃兵，把我五花大綁吊在屋梁上，用皮鞭抽打起來。經過求人說合，又借來七石豌豆，給了偽保長，才把我放了回來。

家，徹底破產了，日子更難熬了。我成天象掉在黑咕隆冬的深井里，找不到出路，喘不過氣來。直到一九四九年汝南解放，我才見到了青天。

李世平 口述

中共汝南縣委宣傳部 整理

選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血淚春秋》

两块疤痕

我家住在河北省灤平县张百湾山前村。祖辈三代都给地主扛活。爷爷扛了一辈子活，最后却落了个饿死。家里没钱埋葬，奶奶求地主帮忙；地主不但不管，还把奶奶赶了出来，说什么“冲”了他家的福气。奶奶只得沿街磕头，乞讨了三捆秫秸，用柳条子编成箔，才把爷爷包起来入了土。

我父亲从八岁起，就给地主“二閻王”放羊。长大后，就给地主扛活。直到解放，整整当了四十年牛马。我父亲天天吃糠面饽饽，饿得常常头昏眼花。有一回，他从山上摔下来，脑袋受了伤，地主也不管。家里没钱看病，伤口化了脓，长了蛆，后来用桃树叶子的水洗，才保住了一条命。

在旧社会，我跟爷爷、父亲的命运一样，八岁就给地主“二閻王”放牛。放牛回来，还要干杂七杂八的活。一天，地主老婆叫我帮她烧火。她不小心，差一点叫柴火绊倒，却把气出在我身上，拿起红通通的通条就往我身上扎，把我的腿扎了个窟窿，到现在还留着伤疤。到了一九四七年，我再也不愿给地主当牛做马，宁肯饿死也不干了。谁知地主“二閻王”暗中勾结伪保长孙景亮，把我抓去顶壮丁，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。

一九四七年旧历腊月二十七傍晚，我和两个同伴从山上打完柴往回走，迎面来了几个国民党匪军，他们像疯狗似地一拥而上，将我们五花大绑，架上汽车，拉到五六十里以外的地

方，綁在破庙的大柱上。这天天气很冷，寒风刺得浑身直打哆嗦，我的手脚都麻木了，但神志还清楚，不由想起了早晨在家的情景。早晨，媽媽向邻居借了几升米，对我說：“孩子，上山打些柴回来，咱好过个团圆年。”誰料到会遇到这班强盜！我咬咬牙，决心逃走。终于，挣脱了绳索，避过敌人的崗哨，逃出了虎口。在鸡叫时，我回到了家。这时，父母妻子已急得死去活来。按說，回来了就該过个团圆年吧，可是我知道敌人还会来抓我，不能待在家里，只好含泪告别父母妻子，逃到姑姑家避难。

国民党反动派沒抓到我，就使用了毒計。伪保长孙景亮带着匪軍把我家包围起来，逼着我父亲說：“交出儿子便罢，不交出就封你的門，全家滾蛋！”这时，地主“二閻王”假充好人，从中調停，叫我家拿出五石大米来，爷儿俩再給他扛一年活，可以保证“无事”。砸碎骨头也拿不出五石大米呀！放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去，要死死我一人；一条是不去，一家五六口人活活地冻死或餓死。我被迫走上了第一条路。就这样，我又被綁进了国民党軍队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底，我被补进匪三軍特务团。到那里后，每頓只給吃一个小孩拳头那么大的窩窩头。第一次操练，因为身体虛弱，操练半小时就昏倒了。匪軍穆班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，他見我倒在地上，就用枪托打我，并把我的枪摔在地上，将枪的准星摔掉了。后来，排长、連长說是我摔坏了枪，又狠狠地打我，打断了三根扁担，把我打得死过去两三次。打了还不罢休，又把我拖到連部，逼我跪在玻璃碴上。刚跪上去，两腿就流出血来，我又昏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我醒过来了。睜开眼一看，只見四面

漆黑一团，四周死一样的寂静，地上湿漉漉的。我心里想：难道我死了吗？我慢慢地挣扎着站起来，两腿还没有站直，头就碰了顶。用手向四周摸，摸到了阴凉的泥土。啊！我没死，是蹲在地洞里。我屁股上、背上、大腿上都受了重伤，不能坐也不能躺，只好胸贴着地，趴在地上。一个绝望的念头涌上心头：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！一定会死在这班强盗手里，再也见不到父母妻儿了……正在想的时候，只听得有人在喊：“德江！德江！”我一听声音，知道是同乡李库。不一会，李库抱了一条又破又薄的被子和一些枯草进来，给我铺了个地铺，还递给我半个窝窝头，气愤地说：“王八蛋班长，把分给你的一个窝窝头给抢去了半个。”我说：“只要我有口气，饶不了他！如果打仗的话，我就先把他干掉！”

从此以后，李库每顿给我送来半个窝窝头，就这样苦熬着，一直熬了三个月，屁股上的伤渐渐好了，结了两块碗口大的痂疤。不几天，两块痂疤掉了下来。我看着这两块痂疤和从背上脱下来的半尺多长的皮，又恨又伤心地掉下了泪。我拾了块破布，将痂疤和皮包了起来。心里想：“这是血泪的见证，这是仇恨的见证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报这血海深仇！”

三个多月后，我爬出了黑暗的地洞。我哪儿还象人，头发足有五六寸长，都结成了饼，生了虱子。地洞外，天气阴沉沉的，弟兄们正在背砖石，修碉堡。我刚蹒跚地走出洞口，又给反动班长看见了，他走到我跟前，恶狠狠地狞笑着说：“你还没死？休养了这么多天，该干活去了，走，给老子背砖去！”

我这个风吹即倒的人，怎能背得动砖？可又没有办法，只得跟着他走。走到砖堆跟前，他命令我背六块大方砖（一块有

三十多斤)。我的天哪！我哪有这么大的力气啊！和他說了半天，他定要我背三块。我背起三块方磚，沒走几步就摔倒了。反动班长用日本刺刀对准我腿肚子就是一刀，我疼得在地上直打滾。我憤恨极了，心想，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，决不能让他们白白折磨死。于是我决心逃出虎口，去找八路军！誰知我这打算給匪連长看出来，立刻把我关了起来。一天早晨，連里抓回一个开小差的和我关在一起。我走上去一看，原来是李庫！他見我就偷偷地說：“德江哥，我活不成啦！給我报仇！”說着，就嚎啕大哭起来。这天上午，匪連长命令班长押着我和李庫，一人挖一个坑。我想，也許要把我俩枪毙了。真的，坑一挖好，就把我俩五花大綁捆起来。匪連长把全連士兵帶到坑前，然后叫我俩跪在坑边上，对大家大声說：“誰要想开小差，这就是下場！”說着，只听一声枪响，李庫栽到坑里。匪連长又把枪口对准我，左瞄右瞄，只听“崩”的一声，子弹在我头皮上擦过。匪連长打了一枪，就走上来，恶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罵道：“兔崽子，再想开小差，就跟他一样！”

这是什么军队！这是什么生活！就是死，也不能給他們卖命，我还是决心开小差。一九四八年十月，我們从承德撤到古北口；十一月，又撤到北平，駐在东便門附近。这时，北平已經給解放軍包围了。我們的工作是拆民房，修碉堡。第一天去拆民房时，看見許多老百姓无家可归，哭天喊地。不由地就想起了父母、妻儿的遭遇，我說什么也不去拆，决不昧着良心干缺德事。反动班长見我不动手拆，抡起皮带就猛抽，皮带上的铁环子把我的头戳了两个窟窿。匪連长走来，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罵道：“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，还不如一头猪，养头猪，还能吃口肉！”我心里想：“別逞凶，狗杂种，你們也长不了啦！”一位



反动班长用日本刺刀对准我腿肚子就是一刀，我疼得在地上直打滚。

老大娘见我头上鲜血直流，不顾反动派的拦阻，走过来，解下扎裤腿的布带，绑住了我的头。在修碉堡的时候，我发现东便门城墙底下有个洞，洞口用铁丝网扎住，我打定主意从这洞口逃走。不久，到了阳历年的除夕晚上，我趁国民党匪军们大吃大喝的时候，偷偷地逃出兵营，走到东便门城墙底下，弄断洞口的铁丝网，钻出了洞。城墙上的敌人发现了我，向我开枪，我理也不理，一直向北奔去……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元旦，碰到一个头戴羊皮帽、身穿黄军装的人。我一看，就知道他是解放军。可找到自己人了！可见到天日了！那人瞧了瞧我，大声问：“干什么的！”我回答：“从国民党军队逃出来的。”那人警惕地走到我跟前，在我身上摸了摸。我身上除了一个包痂疤和肉皮的小布包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把小布包拿给他，他打开一看，惊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我把这两块痂疤和肉皮的来历向他说了，并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，消灭反动派。他听完，温和地说：“好，跟我走吧！”他把我送到了补训团，分配在三营。我们班长姓刘，他一见我，分外亲热，端来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水，叫我洗脸洗脚，又端水给我喝，还叫我换衣服。我感动得眼泪止不住往外涌。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苦熬了八九个月，连一口热汤热饭也没吃到，每天的家常便饭是挨打受骂；现在刚到这里，班长就这样待我，还叫我同志，天下竟有这样好的军队！从此以后，我就在这里参加集训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们开始诉苦。在一次诉苦会上，我倒出了积在心中的苦水，又拿出两块痂疤和肉皮给大家看。大家看了，都痛哭流涕，高喊：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于德江

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《血和泪的回忆》

人財兩空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我的家鄉——湖南省臨武縣，還被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着。在那樣的世道，真是兵慌馬亂，災難重重。

一天早晨，媽媽正在忙着煮野菜，突然村裏的保隊副“泥鰍”闖進門來。

“泥鰍”名叫鄧杠杠，是村裏出名的土霸王。他當了個保隊副，借官府和地主的勢力，想盡辦法敲詐老百姓，真是“干竹竿也要熬出二兩油來”。全村人恨透了他，背後都管他叫“泥鰍”。“泥鰍”進了屋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做飯啦？”說着湊到鍋邊，皺皺眉頭說：“喲！怎麼吃起野菜來了，要沒糧食到我家去拿點，何必……”

爸爸知道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——假慈悲，就忙說：“大隊副，咱屋子又小又髒，連個座兒都沒有。你要有什麼指派就請吩咐吧！”

“泥鰍”眨巴眨巴眼說：“也沒什麼大事，‘蔣委員長’下令要招兵。你家禮田够年齡了，趕快準備一下吧！”

“啊！”這真是晴空一聲霹靂，爸爸媽媽都嚇呆了。半晌，爸爸才緩過氣來說：“大隊副，使不得呀！我這一家五六口人，全靠我們父子倆種地糊口，他要一走，不是脊梁背上抽筋嗎？這叫我們怎麼活啊！”

“說的也是，可這是‘蔣委員長’的命令，誰敢違抗？”

“大隊副，你行行好吧，不看老的，總還得看看這群孩子啊！”爸爸推着我和妹妹，到“泥鰍”跟前求情。

“泥鰍”不耐煩了，把我和妹妹一把撥開，板起面孔說：“你們讓我看，我讓誰看？”

“大隊副，反正禮田是不能去啊！”

“什麼？”“泥鰍”卷起袖子，露出一臉凶相，指着爸爸的鼻子說：“告訴你，你兒子這兵算招定了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到時候來抓人，可別說我翻臉不認人！”說完，一扭屁股就往外走。

媽媽忙撲過去扯住“泥鰍”的衣襟說了不少好話。“泥鰍”眼珠上下直打轉，一把推開母親，吊起了嗓門說：“好吧！不去人也可行，可要出錢！”

“出錢！多少錢？”

“泥鰍”摸摸下巴，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一張，說：“八十塊銀元。”

“八十塊？！唉呀，我連八毛也出不起呀。大隊副，求求你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少廢話，一個子兒也不能少，三天內交齊。到期不交，哼！……”“泥鰍”梗着脖子得意地甩着胳膊走了。

爸爸氣的两眼發直，牙咬的“格格”作響，媽媽一頭撲到床上痛哭起來。我和妹妹吓呆了，在牆角動也不敢動。煮野菜的鍋里咕嚕咕嚕直冒熱氣，灶口冒出一股股黃煙，噲得一家人喘不過氣來。

這可怎麼辦哪？爸爸今年五十多了，身子骨又不結實，全



“泥鳅”指着爸爸的鼻子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儿子这兵算招定了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”

家五六口人的日子全靠哥哥支撐着。抓走了哥哥，就象茅草房抽去了大梁啊！“賣東西！”爸爸轉過身來，抱起家里僅有的一床破棉被出去了。

時間已經過去兩天了，家里能賣的東西都賣了，七拼八湊的才湊了三十塊銀元，這還差五十塊呢。

天一放亮，爸爸又冒着雨出去借錢了。已經過晌午了，還不見他回來，我肚子早就餓了，妹妹哭喊着媽媽要吃飯，媽媽好說歹說也不行，只好把留給爸爸的一個菜團掰一半分給我們倆。

天漸漸黑下來，突然門響了一聲，爸爸沒精打采地回來了，全身已經濕透了，衣服上都是泥漿，雙腿直打顫，臉上發黑。沒等媽媽說話，爸爸便解開上衣，從懷里掏出一個鼓鼓囊囊的布袋，往桌上“嘩”地一放，一屁股坐在床邊上。媽媽用手輕輕地摸了一下，便急忙地問：“哪兒借來的？”一連問了幾聲，爸爸都是低頭不語，兩隻手使勁抓著頭髮，臉上的肉不住地抽搐，媽媽也不安起來，便一個勁地追問。半天，爸爸才抬起頭來嘴唇顫抖著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這……這不是錢，是閨女的肉啊……”話沒說完，眼淚早流下來了。

媽媽一聽這話，“啊”了一聲，身子一晃便昏過去了。爸爸和哥哥急忙把媽媽抬到炕上，過了一會兒，媽媽才慢慢睜開眼睛，用呆滯的目光看著我們，突然伸出兩手一下子把妹妹摟在懷里，放聲痛哭起來。原來是爸爸把妹妹賣給陳家村的財主趙貴山了。屋外風雨敲打着門窗，發出淒慘的響聲，一家人圍著妹妹，哭紅了眼睛。

天黑了，四周寂靜的怕人，爸爸輕輕地從媽媽的懷里把睡

着的妹妹抱过去，放到床上，瞅着，叹了口气，便轉过身去。爸爸真不忍心看妹妹呀。媽媽搖晃着身子站起来把一根“松明”点着，从破柜子底下掏出一件破布衫，坐在那吃力地縫着。这件破布衫，是用奶奶临死留下的一件破青袄改的。哥哥穿过它，我也穿过它。上面的补丁摆了一层又一层，已經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。媽媽准备給妹妹縫个袄，縫着縫着眼泪噗嗒噗嗒掉下来。媽媽縫好袄，凑到妹妹身边，用手輕輕撫摸着她那瘦削的脸蛋，低語着：“孩子，爹媽对不起你呀！从你生下就沒吃頓飽飯，也沒穿件象样衣裳，如今又把你卖了，从明天起就見不着媽媽了。孩子，不能怪爹媽心狠哪！……”媽再也說不下去了，一下子俯下身去，捧着妹妹的小脸，使劲地亲着。

沒等天亮，爸爸就带着八十块銀元走了，哥哥也上山打柴去了。媽給妹妹洗了脸，又把她抱在怀里，輕輕地給她梳头，一边哄着一边囑咐着。还不大懂事的妹妹，不住的“嗯、嗯”答应着。

过晌，赵家的两个狗腿子領妹妹来了，到家二话沒說，就要把妹妹拉走。媽媽一把抱住妹妹，看了又看，亲了又亲。妹妹象明白了什么，也紧紧地樓住了媽媽的脖子，两只小腿上下乱踢蹬，哭喊着：“媽呀……媽呀……”媽媽的心象刀攪似的难受，刚刚咽下去的泪水又流了出来。突然，那两个狗腿子从媽媽怀里夺过妹妹就往外跑。媽媽和我急忙追出去，人已跑远了。媽媽抱着我坐在地上也泣不成声了。那两个家伙走到村头，正巧碰上爸爸，爸爸想看看妹妹，可那两个人恶狠狠地推了爸爸一把就走了。

难熬的一天总算过去了。天已經黑了，可是哥哥還沒回

来。媽媽睜着两只紅肿的眼睛，惶恐不安地倚在門口张望。爸爸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怕又遇着了什么……”話音刚落，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。媽媽以为是哥哥，一把抱住，仔細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王大嬸的儿子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大叔，不好了。我和礼田哥在山上打柴，突然来了一帮乡丁，把礼田哥抓走了！”

爸爸一听气紅了眼，罵了声：“‘泥鳅’，你心好狠哪！”就闖出門去了。

他一口气跑到“泥鳅”家里去要人。“泥鳅”瞪着眼珠子說不知道。爸爸要拉着“泥鳅”到县里去讲理，“泥鳅”反咬一口，說爸爸无理取鬧，就指使几个狗腿子把爸爸押到县城，毒打了一頓，关进了监牢。

卖了妹妹，抓走了哥哥，爸爸还进了監獄。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抓兵抽丁，給我家带来的灾难。

这刻骨的仇恨，我永远不能忘記！

邓礼全 口述

錢立匡、姚国义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半記血泪仇》

装了八年“哑巴”

一九五一年，四川省自贡市俞冲（富全公社）在庆祝村政权成立的大会上，八年的哑巴田少华走上台去，忽然说话了。他含着泪花激动地说：“旧社会逼得我们穷人有口难开，现在来了救星共产党，恩人毛主席，有我们穷人说话的权利了，我田‘哑巴’也要发言了。”这时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高呼：共产党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人们都把田“哑巴”被迫装哑的事当作国民党反动派压迫、摧残劳动人民的一件活的罪证。

田少华刚刚长大成人，拉壮丁的灾难，就降临到他的头上。伪保长涂鹤鸣看他年轻力壮，正好是敲詐钱财的好机会。头一回抽签就抽中了他，并派人去抓他。田少华听到信息马上逃跑了。伪保长逼着他父亲要人，并把他父亲押起来，声音除非立刻交出三十四元大洋，另外雇一个壮丁，不然就不放人。田少华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当卖精光，又东借西凑才弄到二十九元，托人讲情，并打了五元的欠条给保长，才把他父亲救出来，他家就这样倾家荡产了。没过几天，保长逼着要欠款，田少华和他的父亲、母亲，只好去当小工，日晒雨淋一连干了两个多月，才凑足五元钱，交清了这笔欠款。他们心想出了钱免灾，这一下可以放心过日子了。可是一年以后，重新“划保”，又把田少华一家划归伪保长胡德之管辖了。不久胡

德之就派人把他家紧紧包围起来，又要抓田少华去当兵。这次田少华是从茅坑里跑脱的，以后就再也不敢露面了。

田少华在家里，用柴草做了一个洞，躲在里面不敢露面。一连躲了三个月，没有见一丝阳光，脸上无血色，走路打晃晃，眼看要活活憋死在里面，才跑到几十里外的狮子坡给一家姓邓的富农当长工，他想这回可以过几天安宁日子了。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，穷人哪会有什么好日子！每天都是两头点灯吃饭，白天做地里的活，晚上吃了夜饭就喂猪、轧猪饲料、碾米，刚倒在床上睡着了，富农就又催着起床出工。田少华过不了这种日子，想念家里的父母和妻儿，但回家又怕拉壮丁。他听人说砍了手指能免壮丁，就磨了一把篾刀，忍着十指连心的剧痛，在山上干活的时候，把左手的指头一下砍掉两个，血流不止。当他从富农那里归家的时候，在路上昏倒了三次。田少华夜间回到家来，母亲一见他把手指头砍了，就悲痛地放声大哭，“儿呀！你怎么成了这样子呀！”家里其他人也都痛哭不止。

二十多天以后，田少华手上的伤口医好了，这时他才知道砍手指头那天因为心里发慌，错砍了左手指头。国民党伪保长听说他砍了手指头，便诬赖他是抗丁，硬要抓去坐班房，又说右手没残还能当兵。田少华经这一气，得了一场重病，他想：出钱、住黑屋、帮人、割手指头，都躲不过拉壮丁的灾难，你们总不会拉哑巴当兵吧！于是，田少华就忍着痛苦，趁病装起哑巴来了。虽然家里请医生很快把他的病医好了，他还是不说一句话，急得父母和妻子都痛哭。他心里也很痛苦，但还是不说话，怕告诉家里人后走漏风声。儿子和女儿亲热地喊他，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耳朵听得到，就是不开口。从此，他白天当着人，总是哇、哇、哇地又比划又乱嚷，晚上背着人暗中流泪。田少华因为抗丁被逼成了“哑巴”，可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还是不肯放松。伪保长陈维洲，硬说田少华是装哑巴，先后把他送到乡上、县里去检查。由于田少华装得逼真，没有被检查出来，才免除了这场灾难。

田少华从一九四三年开始装哑，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开始讲话，为抗丁整整装了八年哑巴。

田少华从发言那天起，逢人便说：是党使我“哑巴”能开腔，是毛主席给了我发言权，我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永远跟着毛主席走。

（王文路、蓝玉鸿）

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《翻身不忘阶级仇》

两种兵的生活

我当过国民党的兵，也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。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，说说国民党抓兵给广大劳苦人民带来的灾难，说说两种军队、两种不同的士兵生活。

被抓壮丁

我家住在贵州金沙县茶园乡。一九四八年旧历正月初五，我到未婚妻家去探亲。刚到岳父家不久，一群保丁就象饿狼一样扑上来，要抓我去当兵。

我是喝苦水长大的，在苦难的生活中磨炼出一种不屈的性格，一看要抓兵，一股怒火直顶脑门。我推倒了几个保丁，踢开保队副的步枪，顺手抓起一盆小石磨，便向门口冲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坏蛋拖住了我的右脚，保丁们一拥而上，把我五花大绑地捆起来，边推边打送到乡公所，押进了一间屋子里。

进屋我抬头一看，这间屋子不大，又潮湿，又阴暗。里边坐着七个男人，还有五个女人。

我感到很奇怪：怎么还抓妇女呀！

这时，身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愤愤地说：“没有什么奇怪的！他们抓不到男的当兵，就抓女的来抵押，男的不来，女

的就不放！”

他刚说完，那五个家里还有吃奶孩子的女人就“哇”一声哭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乡丁们用麻绳把我和别的壮丁一个个捆住双手，送到了国民党县政府。并强迫换了衣服，剃成光头，说是“改头换面，为国效劳”。接着，就押送到贵阳去。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极了，就在去贵阳的路上，也没让我们好好走，当官的强迫每人背三四百个当地的名产松花蛋，大搞走私活动。

从金沙县到贵阳，三百六十多里地。我们背上沉重的背包，再驮上三四百个松花蛋，每个人负重都有六七十斤。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累得够受，更不用说那些年老和年少的“壮丁”了！可是，你驮不动也得驮。不然，当官的就拳打脚踢，还不许你倒在地下，因为他们怕摔碎了松花蛋！

我们一天一天的走着，一步比一步艰难。有一天，忽然发现队伍后边跟着一个年轻的苗族女人。她头包白麻布帕，身穿蓝麻布衣裙，怀里抱着孩子，脚上穿着草鞋。队伍走，她也走；队伍歇，她也歇。她总是那么眼泪汪汪地跟着队伍，走着，哭着！哭着，走着！

当官的发现了这个女人，立即查问。原来她是一个姓古的苗族壮丁的妻子。这时，一个军官举起了鞭子，叫她立刻离开队伍。那姓古的青年，急忙跑出行列，拉住那军官求情。那军官一把摔倒了青年，直奔那女人走去：“他妈的，不准跟着走！不准跟着走！”

那个可怜的苗族妇女，赶紧搂住怀里的孩子，在毫无遮掩

的路上飞跑，那个凶恶的军官，在后面就象一只恶狼一样地追赶！

当那个军官撵上她的时候，鞭子就没头没脑地打下去。直打得那苗族妇女趴在地上，左躲右闪，用全身掩护着怀里的孩子。

第二天，队伍又向前移动，那个苗族妇女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出现了。她还是头包白麻布帕，身穿蓝麻布衣裙，怀里抱着孩子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跟在队伍后边，走着，哭着！哭着，走着！当官的又暴跳如雷了。

“他妈的，你是孟姜女，要哭倒长城吗！”

他们连骂带打，又把那可怜的苗族妇女赶跑了！

可是，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当官的谩骂也罢，辱打也罢，那个年轻的苗族妇女，还是跟着自己的丈夫走！从她丈夫被抓的那一天起，她从贵州省金沙县二登崖乡开始，一路要饭一路走，一直跟着丈夫走到四川省綦江县，一共走了一千三百四十多里地！

我和被抓来的壮丁们，天天看见那个跟在队伍后边，怀里抱着孩子眼泪汪汪的苗族妇女，一想起了自己家中的妻儿老小，没有一个不心酸，没有一个不落泪！

兵的苦难

我们被押到贵阳以后，就被赶去听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的“训话”。他说：“你们都是中国的好儿女，应当为国效劳。干它三年五载，就可以象我一样，当上一个官儿。至于婆娘们嘛，不稀奇，将来还可以找洋学生，又漂亮，又时髦。你们应当

好好打仗，……”

我听到这儿，气得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龟孙子，我們沒有土地，保卫什么！”

第二天，壮丁們就开始受訓練。每天除了立正、稍息、跑步以外，还要学唱什么“三民主义，吾党哆嗦”的歌。

一天，全中队集合学歌子。我不識字，学不会那些“吾党哆嗦”，哼哼的声音也就小了一点。中队副走过来，就是一拳。我刚向后一退，第二拳又打了上来，我又向后退了一步，接着，又是狠狠的一拳。

这时，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士兵，偷偷地告诉我說：“你不要动，挺住嘛！”誰知这话让中队副听到了，他轉过手来就給这个士兵两个耳光，打得他当时就鼻孔流血，还骂他：“媽的，誰叫你告訴他的！”我望着身边的伙伴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但是，看着面前的恶狼，心里又升起一股怒火。

我挨打受罵，并不只是这一次，因为吃不飽飯，我說了一句“沒有吃飽”，就被值星班长打得臉紅腮肿，鼻孔流血，还要罰跪在煤渣上，說“吃飽了”！因为跳不过木馬，翻不上单杠，也遭到毒打。还有一次，我身上生了疥疮，血呀，膿啊，順着大腿往下淌！操练时，一时沒有走好步子，被罰跪在碎碗碴上，两手举起，两眼平視，头頂一块磚，上放一碗水。当兵的在国民党反动派軍隊中所受的那份折磨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！

当兵的有冤无处訴，有苦无处說。唯一的出路，只有逃跑。

不久，我們要补充到蔣匪正規軍里去，队伍里逃跑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一天，队伍轉移遵义。忽然，传来一道命

令：队伍停止前进！我和大伙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这时，只听哨音一阵紧一阵，口令一个跟一个。当官的气势汹汹，把士兵们撵到一起，摆布成一个讲话的队形。

一会儿，大队长开始“训话”了。他说，有一个士兵，不愿为国效劳，做了逃兵。现在，要以军法处置，活埋！接着，一群卫兵把那个士兵推到了队伍的前面。

我一看，就吓呆了！原来这个士兵是我的同乡，名字叫张登路。他刚刚十五岁，并且是一个独生子。

大队长向大家训完话。有一个士兵对另一个士兵说：“你们金沙县的人，讲讲情嘛！”这时，也不知那个士兵喊了一句：“金沙县的弟兄们，出来吧！”

我和金沙县的四百多名士兵，一下子都走出了行列，一齐向大队长求情。

可是，那个披着人皮的大队长，不仅不准讲情，还恶狠狠地说：“中国有的是人，埋了他只等于埋一只鸡。”

张登路一听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活命了，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他一边哭着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们四百多个同乡说：“大哥们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家，就告诉我的爹妈……”

大队长没有让他说完，就命令说：“带下去！”

一群卫兵立即拥上前，将张登路从上到下，用绳子绑起来。然后，象抬一根树桩，抬着他走到公路旁边，将他直挺挺地立在已经挖好了的泥坑里。接着，十几把铁锹就扬起了泥土。

当泥土埋到他腹部的时候，他就呼吸困难，喘不过气来了。当泥土埋到他胸部的时候，他的鼻孔向外流血，眼珠都凸

了出来。再往后，他痛苦的連样子都变了。誰能忍心看一个才十五岁的孩子受这种罪啊！可是，就在这时，大队长突然喊了一声：“住手。”然后用手指着那个只有头部露在泥土外的孩子說：“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？誰若开小差，就是这样！”

他說着，就命令队伍順序走过那个孩子的身旁，要每一个士兵都扭头看一眼。但是不准流泪，不准議論。

我們听到这个野兽的命令，都气炸了肺，恨不得当下就把他剥成肉泥，可是，当时办不到。我們不得不又一次将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！

三 次 逃 跑

到了四川省綦江县，我被編在蔣匪軍五十七师，預备四旅二十二团，一营二連三排七班。营房是一幢很寬大的通間。上下两层的木板床，我睡在下层，旁边是同乡张貴周。

第二天深夜，我忽然被人推醒了。我睜眼一看，副排长侯連富，正气势汹汹站在我的面前。他說：“张貴周哪里去了？”

我回头一看，张貴周果然不在了！我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急忙回答說：“不，不知道。”

我的話音还没有落，侯連富伸手就打了我几个耳光，嘴里还罵着：“他媽的，你还說不知道，你还說不知道！”

我被打得眼睛直冒火花。但还是咬着牙說：“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”

侯連富打累了，就命令其他士兵把我綁在床架上。并且，不准低头，不准合眼。否則，就打！我挺着脖子，瞪着两眼，又恨又气，心想：这那是军队，簡直是人間地獄！

天亮的时候，侯連富把全排的士兵帶到河灘上，又把我推出隊伍叫我說張貴周是怎么逃跑的，還有哪些同謀的人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還是那句話：“不知道！”

侯連富一听，立刻扑上来，拳打脚踢。打了一阵以后，他又命令士兵把我按倒在地上，压住我的头和脚，叫士兵們用扁担輪番打。但士兵們都不忍心打。

侯連富看士兵不打，就站在他們身后，踢他們的腿，逼着他們打。士兵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含着眼泪举起了扁担。

扁担，打断了，扔在一边；褲子，打破了，露着皮肉；肌肉，打肿了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；鮮血，淌了一地！我暈过去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暈过去，已經奄奄一息。

侯連富并没有就此罢休。他又命令士兵們在河灘上挖了一个深坑，要活埋我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連部的传令兵跑来向侯連富低声說了几句話。接着侯連富就狠狠地对士兵們說：“把他拖回去，就这么让他死，还便宜了他！”

当天夜晚，我仍然是昏昏迷迷。也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听见耳边有人說了一句：“你千万莫声张啊！”接着，我又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山洞里。身旁有一个姓王的副班长，还有两个与我同时入伍的士兵，一个姓楊，一个姓李。

原来，那天早晨，姓王的副班长看見連部传令兵与侯連富說了几句話，侯連富就把队伍帶回了营房。他估計一定是要改个日期，再集合全連的人活埋我。这位副班长是一个老兵，



副排长侯连富又命令士兵把我按倒在地上，压住我的头和脚，叫士兵们用扁担轮番打。

听得多，見得广。他清楚，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下去，沒个好下场。于是他便与姓楊的和姓李的两个士兵商議逃跑，并且为了救我，把我也背了出来。

我們几个人躲在山洞里，沒吃沒喝。后来，遇到了一個老大娘，她很同情我們，憐憫我們，每天都給我們送点吃的东西来。

起初，我暈迷不醒，他們几个誰也不忍心离开我。現在我已經苏醒过来，四个同患难、共生死的弟兄，再也憋不住肚子里的冤气了，便抱头大哭一場！最后，姓王的副班长对我說：“我們也不能久蹲在这里，大家还是分手，各奔家乡吧！你先在这里养伤，伤好以后再轉道回家吧。”我們四个人就这样分別了。

我在山洞里养伤，那位老大娘天天来給我送飯，还挖草药給我治伤。在那个时候，能遇上这么一位老大娘，我是多么的感激呀！

我的伤稍好了一点，要到老大娘家里去拜謝一番。但是，老大娘阻止了。她說：“孩子，謝什么呀，到村里去危險啊，你还是快逃命吧！”拜辞了老大娘，翻山越岭向家乡走去。

可是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都抓壮丁，貴州抓，四川同样抓，我在半路又被抓去当兵，但很快就逃跑了。后来在成都，我又第三次被抓。幸亏这时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成都，我被抓去的第三天，那支军队就宣告起义了，我才永远逃出了虎口。

在自己军队里

解放后，我随着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参加了人民解放軍。但一时还不能領会“解放”这个词的深刻意义，也不了解人民

解放軍与国民党军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

傍晚，解放軍部队开飯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吃革命队伍的飯。我盛了滿滿堆尖的一碗大米飯，很快地就把它扒到肚子里。这碗飯，实在是香极了！

我手端着飯碗，眼盯住飯桶，迅速地又吃了一碗。

这时，旁边的一个老战士对我說：“別着急，慢慢吃，不够再煮。”我一听，心里想，大概是不滿意我吃多了。不然，就是故意騙我慢点吃。不管怎样，我吃一碗是一碗。

我又一連吃了几大碗，直到肚子脹得鼓鼓的，才放下了碗筷。可是，誰也沒有責怪我一句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：当兵还让吃飽飯！

过了几天，連队在操場上訓練动作。我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，但是，一些操练的动作，还是不熟练。所以，这次操练，又不得不瞅着別人。別人动，我也动；別人走，我也走。尽管很用心仿效別人，但步子总是不那么協調。象过去一样，心里七上八下的很紧张。

果然，班长袁栏宣喊了一声：“雷亮华，出列！”我一想糟了，这一頓毒打又逃不过了。我战战兢兢地走到行列前面，努力挺起胸膛，站穩脚跟，因为我已經有了經驗：长官打的时候，千万莫后退。

出乎意外，班长袁栏宣走到我的面前，既沒有举拳头打，也沒有抬脚踢，而是做示范动作給我看，耐心地教我。

晚上点名的时候，都唱歌子。大家唱歌的声音很宏亮。歌儿听起来，亲切，易懂，既好听，又好学。我跟着唱了几次，很快地就学会了《东方紅》、《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》，以及

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。每当我唱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的时候，总不由得想起那次唱不上来“吾党哆嗦”挨打的情景。

这时候，我好象明白了很多东西。但是，要问我明白了什么，一时还说不出来。

一天，班长袁栏宣和我谈心，从生活谈到工作，从部队谈到家庭。一提起家，我就忍不住眼泪往下淌。我把父死母嫁，二哥自幼被卖，大哥和二姐小时要饭被狼吃掉的惨况，全告诉了班长。班长听了，也和我一同流泪。

从那一天以后，我觉得指导员、连长，以及全连的战士，对我都非常的亲近。特别是班长袁栏宣、副班长鍾廉清、一组长朱希庭、二组长孙永根四个共产党员，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我。我表现好的时候，他们就及时地表扬鼓励；我有了缺点和毛病，他们就耐心地帮助批评，给我讲革命道理。

我还是不明白：他们为什么这样的爱护一个当兵的呢？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为什么都象兄弟一样，又团结又和睦呢？

后来，经过了诉苦运动，我受到了阶级教育，知道大家都是阶级弟兄，才真正的明白了一个极重大而又极简单的真理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队伍！

从此，我就决心要做一个人民的子弟兵。

锻炼成长

一九五一年，我已经是一个青年团员了。这时，上级派我到梁平县去接新兵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这么一个怕拉壮丁的人，居然也

去接新兵。当然，解放军接新兵与国民党拉壮丁有本质的不同。但是，我对这项新工作没有经历过，不免有点担心：万一人家不愿当兵呢？

我跟着同志们到了梁平县，立即展开工作。没有几天，全县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翻身入伍的热潮。各乡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。

被批准的青年，戴着从地主家分来的丝绸扎成的大红花，一个个骑红马，坐滑杆，威风凛凛。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入伍。我望着那些兴高采烈的新战士，不由地就想起了自己过去被乡丁五花大绑押进乡公所的情景，我羡慕这些新兵，同时也更加痛恨旧社会。

当时，上级指定我暂时担任新兵的班长。我又有点犯愁了。因为，我还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呀！没有办法，只有仿效别人领导自己的做法去做。我先给新兵搭铺，再给新兵打洗脚水。白天给新兵讲革命道理，晚上给新兵盖被子。总之，我尽自己所知道的和所能做的，都一一地做了。每做完一件事，心里都很愉快。因为，我觉得我是按照共产党员袁桂宣同志的领导方法去做的。

一天，我带着新兵上操。有一个姓夏的新兵，怎么也学不会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很坦率地说：“想妈，我不想当兵了。”

“不想当兵了？”

“嗯，我今晚就回去！”

这个新兵，说得这么轻松，我听了，不由得又想起了国民党军队。在那里，士兵逃跑，抓回来就活埋，现在，这个新兵居

然可以向班长宣布：不想当兵了，今晚就回去！我一时气得話都說不出来。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自己，仿效老班长的方法，与这个新兵談心。

“你媽在哪？”

“在家里。”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这新兵說着，眼圈就紅了。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被保长抓去給美国鬼子修飞机場，累倒了，得了痢疾。美国鬼子把害痢疾的人都推到滾牛塘里，撒上石灰，活埋了。”

这个新兵越說越伤心，我也越听越难过。过了一会，我又問他：“你有这样深的仇，为什么不想报？”

“我的仇已經报了。”

“怎么报的？”

“斗地主恶霸的时候，保长已經被枪毙了。”

“你再沒有仇啦？”

“沒有了。”

这个新兵天真地回答着。

我想了想，又对他說：“台湾還沒解放，国民党蔣介石还想回来，美帝国主义还在侵略我們，我們都不去当兵，誰去解放台湾，誰去保卫革命果实呢！”

这个新兵听着，听着，逐漸地明白了一些道理。但是，他一时还說不出来。不过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不要求回家了。

过了几天，新兵都补充到部队里。我完成了上級給我的任务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，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现在，我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个中尉副连长。我永远忘不了两种“兵”的不同生活。为了保卫我们的江山，我要永远战斗到底！

雷亮华 口述

胡清和 整理

选自春风文艺出版社《闯关东的那一代人》